

新加坡華文
報刊與報人

潘多題 

崔貴強 著

.....

获华文新闻业基金赞助
谨申谢忱

.....

目次

序言	(1)
1. 战前新加坡的华文报刊	(3)
2. 《中兴日报》：新加坡同盟会的喉舌1907-1910	(50)
3. 赤道线上的呼号：胡愈之与《南洋商报》	(75)
4. 胡愈之在战前新加坡的论著	(105)
5. 傅无闷与《星洲日报》	(134)
6. 战后新加坡的华文报刊	(155)
7. 胡愈之与《风下》周刊	(185)
8. 《南侨日报》：新加坡报坛的奇葩	(192)

附图表

表1：战前新加坡华文日报	(15)
表2：战后新加坡华文日报	(157)
表3：新加坡华文小报	(171)
图片 1：《叻报》	
图片 2：《天南新报》	
图片 3：《日新报》	
图片 4：《中兴日报》	
图片 5：《国民日报》	
图片 6：《新国民日报》	
图片 7：《民国日报》	
图片 8：《南洋商报》	
图片 9：《星洲日报》	
图片10：《风下》周刊	
图片11：《南侨日报》	
图片12：战后华文小报	
图片13：《星报》	

序 言

1881年，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日报——叻报——问世了。嗣后，华文报刊(包括日报、小报与杂志等)陆续出版，其中有两个高潮，一个是20世纪20年代，另一个是40年代后半期。在这两个高潮时期，华文报刊纷纷出笼，犹如雨后春笋，出版业蔚为一时风尚。110多年来，新加坡华文报刊出版物，积年累月，卷帙浩繁。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洗礼，这些旧报刊竟侥幸地被保存下来。它们大部份度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里，成为该馆最珍贵的史料之一。

旧华文报刊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它们不仅是研究当地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方面不可或缺的宝藏，也提供了研究东南亚其他国家与中国(尤其是闽粤两省)的有用资料。学者诸如颜清湟与杨进发等人都充分利用了报刊的资料，撰述了鸿文巨著，惠嘉士林。

因此深入介绍华文报刊，撰述华文报刊史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可是由于报刊卷帙浩繁，凭个人的时间与精力，即使终年皓首穷经，也无法窥其全貌，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实非易易。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尚属寥寥无几。计有陈蒙鹤(Chen Mong-Hock)的《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郑文辉的《新加坡华文报业史 1881—1972》、何舒敏的《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日报——

叻报》、王慷鼎的《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与《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博士论文)等,此外尚有若干单篇论文。因此新加坡华文报刊史的研究领域,还大有开拓的余地。我这本书的问世,只不过是狗尾续貂,阐述了报刊史沧海之一粟。

这本书可说是我研究新马华人史的副产品。研究新马华人史,不得不涉猎华文报刊,因为长年累月翻阅报刊,盎然之情,油然而生。有时碰到一些有趣的事件与人物,或是疑惑的问题,便穷源溯流地追究下去,将心得载述下来,便完成了本书的篇章。

本书共收集了8篇论文,其中两篇《战前新加坡的华文报刊》与《战后新加坡的华文报刊》是概括性的介绍;1篇是比较深入地论析《中兴日报,1907—1910》的兴衰、编辑人员与内容;另外4篇是涉及胡愈之在主持《南洋商报》、《南侨日报》与《风下》周刊时所作的贡献与影响;还有1篇是追述名报人傅无闷与《星洲日报》的渊源,并评论他对《星洲日报》所作的应兴应革的报业。读者也许可以从这些篇章中获得一些有趣的材料与有用的知识。

本书蒙新加坡华文传播事业基金会慨予赞助出版经费,才得以付梓问世,谨此致以万二分谢忱。复蒙名书法家潘受老先生封面题字,龙蛇走笔,使本书生色不少,特此致谢。

1993年4月杪

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战前新加坡的华文报刊

(一) 前言

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出版物，是由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来的传教士撰述与出版的，这些出版物的内容都是阐扬基督教义理，用来传教的。但在鸦片战争以后，传教中心迁往中国大陆与香港，布道会出版的刊物渐渐少了。

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日报是《叻报》，于1881年创刊。终19世纪之世，出版的华文日报尚有《星报》、《天南新报》与《日新报》，这些华报的思想保守，内容贫乏，销途呆滞。

进入20世纪以后，华报出版的数量与种类都增加了，介于1900年与1941年间，新加坡出版的华文日报，共达14家之多。它们因政治立场的歧异，常发生笔战，口诛笔伐，互不退让。不过，在《南洋商报》崛起(1923年)之前，华文日报显然经费支绌，人才匮乏，从而影响报纸的内容。直至《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创刊(1929年)后，由于资金雄厚，改善设备，到处延揽人才，华报才显得排版美观，内容充实。

1925年，新加坡第一份小报《消闲钟》出版了。此后小报的出版蔚为一种风气，各种小报杂志，纷纷出笼，前仆后继，不绝如缕，至1929年达致巅峰。数量种类既多，内容就良莠不齐。不过它们的问世，却为当年的报坛平添了几许喧闹的气息。

(二) 19世纪的华文报刊

新加坡早期出版的华文刊物，大抵是由伦敦布道会传教士撰述与出版的。原来在新加坡开埠后不久，伦敦布道会便派遣了一批传教士到这里来宣扬基督教（他们有的是先在马六甲从事传教工作，然后由呷南来新加坡的）。他们有的通晓中文，在旁人的协助下，他们撰写并出版了一系列的中文书籍，内容不外是阐扬基督教义，奉劝华人信奉耶苏。介于1832年与1842年间，中文出版物最为蓬勃，不下44种。¹在这之前的1815年，伦敦布道会传教士更在马六甲出版了《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是一份传教的刊物，亦是新马华文出版物之嚆矢。而1837年复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却是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杂志。

然而，自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香港归属英国以后，伦敦布道会便将传教中心地从新加坡移往香港，大力向中国大陆展开传教事业。随着传教士的北移，新加坡的华文出版物也就沉寂一时。1858年，一份名为《日昇报》的华文周报出版了，但也不过昙花一现。²直至19世纪80年代初《叻报》之问世，才打破这沉闷的局面。

19世纪末期的新加坡华文报，除了《叻报》以外，依序尚有《星报》、《天南新报》与《日新报》，兹分别论述如下：

(1) 叻报(1881—1932)

叻报创刊于1881年12月10日。³它一开始就以日报的姿态出现，是新加坡乃至东南亚最早出版的华文日报。《叻报》的命名是源于“石叻”一词，“石叻”是马来文Selat的音译，意即“海峡”，也是新加坡的旧名。

《叻报》的问世，是与下列因素分不开的。首先是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华南移民的大量涌入。这期间，女性的移入也逐渐增加了。移民中固然仍以低层的劳动人民居多，但其中也不乏知识分子。华人社区的渐形扩大，华文教育的日渐萌芽茁壮，培育了一批华人子弟，华人的识字率日益提高，因此，出版一份华文报，为他们提供本地与故国的讯息，似乎是一种适时的举措。

在此之前，新加坡英文版的《新加坡纪事报》(The Singapore Chronicle)已在1824年出版；60年代末期，更有其他4份英文报的创刊。‘即使人数较少的印度人与马来人，也分别创办了淡米尔文的《新加坡新闻》(Singaiivarta-Mahni)与马来文的《土生回教徒》(Jawi Peranakan)，而占绝大多数的华人却未有华文报的创办，《叻报》的出版可能是受到这方面的刺激所促成。

办报需要有雄厚的财力，亦需具有办报热忱的人，在经济领域里大开拳脚而发财致富的华族商人，大有人在，他们累积了充裕的资金，具有办报的经济能力，80年代初期，具有办报热忱的华族富商也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薛有礼，他是《叻报》的创办人。有礼原籍福建东山人，出身峇峇名门望族。祖父薛佛记与父亲薛荣樾，都是新加坡与马六甲的华族领袖。荣樾经营船务，常到厦门经商，《叻报》草创时，他曾从中国购置运送印刷机字粒抵新，解决了印刷技术的难题。有礼在办报之前，是汇丰银行的买办，那是一门收入丰厚的职业，他积聚了不少财富。他虽受英文教育，但从其家庭背景来看，相信有礼也通晓中文，对中华文化有所认识，并对中国有深切爱慕之情。⁵

有礼以海峡华人的身份，却创办了东南亚第一家华文日报，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那么其动机是什么呢？一般而言，办报的宗旨虽不一，但谋求利润却是共同追求的目标。然而，揆诸《叻

报》销途呆滞，即至1890年杪，日销份数尚未达区区350；虽说《叻报》也吸引了商家刊登广告，但收费低廉，所获不多。创办《叻报》无利可图，有时甚至营业亏损，面临经济危机，因此创办《叻报》谋利之说，似不可能。

有人说，有礼办《叻报》是基于热爱中国的动机，他要通过报纸阐扬中华文化；其次是为新加坡华人服务，企图藉用报纸的言论，发聩振聋，达致移风易俗的效果。此外，有礼也可能藉《叻报》来提高声望。⁶

薛有礼很幸运，一开始就请到了叶季允来主持笔政。更难得的是，有礼十分敬重季允，两人合作无间。从1881年至1921年间，除短期的引退外，季允一直在《叻报》工作了40年，为《叻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叶季允(1859—1921)原籍安徽歙县人，却在广东长大，他不仅善画能文，并且知医识卜，兼精金口诗词，可谓多才多艺。受聘《叻报》前，叶氏任职于香港《中外新报》，已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在他多年的主持下，《叻报》呈现了多姿多彩的面貌。

除星期日与假日外，《叻报》每日出一纸共8版。每月订报费为1元，零售每张5分。初时报纸是在上午出版，但自1899年9月后，改为下午四时出报。

《叻报》初期形式，因袭了上海的《申报》，是综合编排的，通常新闻占3½版，广告占4½版。新闻可分为论说、电音及普通新闻三类。论说即社论，刊在第1版，有些是由主笔或编辑撰写，有些则是转载中国报纸的论说。《叻报》的论说，牵涉面大，论题广泛，它们反映了该报的立场。论说中有署名“惺噩生”的，就是叶季允的杰作。

论说之后为新闻报道，这包括“谕旨恭录”、“电音”（即电讯）、“中外新闻”及“京报选录”。新闻标题多用四字，

如电讯有“英京电报”、“英电续登”；新闻则有“盗匪横行”、“术能役鬼”及“妇人祸水”等等；新闻内容包罗万象，报纸是“有闻必录”，报道大都简短，寥寥数行。新闻不按地域或内容分类，显得杂乱无章。

《叻报》对中国的政治立场，始终是亲当权派的，它反对维新运动，把革命党人视为乱匪，主张效忠清廷，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地位。至于对当地的问题，有人认为《叻报》是亲英政府的；⁷但也有人认为《叻报》的言论主要是以华人的利益为依归的。⁸

19世纪的《叻报》销数低落，创刊时日销50份左右；1883年增至350份；1894年日销450份。但销数并非直线上升，如1887年就下跌到168份。比起同时期的华文报，《叻报》处于劣势。

(2) 星报(1890—98)

《星报》于1890年2月14日创刊，1898年杪停止出版，报龄约达9年之久。

《星报》创办人是林衡南，亦名林光铨，他也是古友轩印务馆的东主。古友轩大约于60年代开始营业，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印务馆，承印中英巫等书籍。由于印刷精美，信誉卓著，故生意兴隆。古友轩既有现成的印务器材，主人因利乘便，于1890年初创设了《星报》，馆址坐落于直落亚逸（源顺街）101号。林衡南中文造诣颇深，亦通晓巫文，曾编纂《华夷通语》，是一本华巫字典，相信他曾参与《星报》的编辑与撰述工作。

《星报》的命名，容易使人与星加坡之地名联想起来，⁹事实并不然。而“所谓星报者，盖取庶民维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之谓也”。因为“报馆之例与轩轳太史将我毋同，故各处之风俗如何，习尚若曷，须知其底蕴，以俟采风问俗者一目

了然，然后发之报章，始不至如盲人测月”。¹⁰这样说来，《星报》的“星”意味着该报的职责是报道世界各地的风俗习尚，好让读者有所知晓，扩大了知识的领域。

跟《叻报》与后来的《天南新报》不同，《星报》没有报道其主笔、编辑等人，其论说（社论）也不署名，因此除林衡南外，对其他编辑人员，我们全不知情。¹¹

《星报》跟《叻报》一样，除星期天及假日外，每日出版一纸共8版。亦作综合性排版。如以1890年2月19日为例，第1版有社论（约占2/3版），报社告白，刊登广告收费规例及重要新闻目录；第2及5版是新闻报道，其形式与《叻报》大同小异，不分地域与性质揉杂在一起，有中国的、意大利的、吕宋（菲律宾）的以及新加坡的；其他第3、4、6、7、8版都是广告。新闻的标题也是以四个字为主，如“吕宋近闻”、“破镜重圆”、“升旗志哀”及“私秤被罚”等等；对新闻的价值也无多大选择，采取有闻必录的原则；囿于讯息的偏狭与采访人员的短缺，新闻内容多呈简略，类似这样综合编排版式，一直被沿袭着。

《星报》虽以商业谋利为主，政治色彩谈薄，但其政治意识无疑是偏向中国的，这表现在其关注中国的命运，怒斥外来侵略者，同情苦难的中国人民。如对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军事失利，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星报》就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痛斥日本侵略者，并希望中国能改革吏治，发奋图强。¹²

《星报》的编辑人员，包括林衡南在内，大多是倾向保守的，如对剪辫一事，《星报》所持的立场是：没有辫子的华人就不是中国人，剪辫的举动必须制止，因为这是疏离祖国与祖先的举措。¹³

不过，《星报》也关注新加坡华族的处境，指出华社的弊

端，19世纪华社面临的严重问题有：娼妓、鸦片、赌博与私会党等，针对这些问题，《星报》都曾撰文论述，促请有关人士与政府的注意，并从而加以改革。¹⁴

据海峡殖民地蓝皮书的统计，介于1891年与1898年间《星报》的每日销数如下：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300	400	350	740	800	970	800	700
(235)	(450)	(340)	(450)	(465)	(500)	(500)	(517)

括弧内为《叻报》的日销数

尽管日销数额有限，但其可靠性仍是值得怀疑的。倘若如表所示，《星报》的销数超过《叻报》，那么，它至少可以和《叻报》并驾齐驱，继续维持下去。然而，到了1898年杪，大概是由于管理不善，以致亏蚀，不得不收盘，数个月后，经过改组，《星报》另起炉灶，改名《日新报》。关于这份报纸，我们将在下面讨论。

(3) 天南新报(1898—1905)

继《叻报》与《星报》之后的第三份华文日报是《天南新报》，它于1898年5月杪问世。¹⁶创办人即鼎鼎大名的丘菽园。

丘菽园名炜萇，菽园是他的字。生于1874年，原籍福建漳州海澄县人。八岁南来新加坡受教育，十五岁随父母返海澄，参加童生岁考。1895年进北京，时值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丘氏激于义愤，奔走上书，不果，从此绝意仕途，旋南来新加坡。父亲丘正忠在新加坡经营米业，成为巨富。

父歿，菽园继承了遗产逾百万元。他具有浓烈的爱国意识，目击满清政府颞顽无能，外患侵袭，因而赞成变法图强。遂于1898年创办了《天南新报》，鼓吹维新思想。

至于《天南新报》之命名，“天南”是泛指中国海洋之南，亦称南洋，殆指今日的东南亚。“天南”地域辽阔，新加坡是“天南”一埠，犹如南洋的一颗明珠，因而在这“天南”一隅新生的报纸，就称为《天南新报》，也是很恰当的命名。

《天南新报》的编辑阵容强大，丘菽园既是报业东主，也兼任华文总主笔，常以星洲寓公、菽园(淑元、宿圆或旭沅)名号撰述专文，阐发议论。在他之下，主笔尚有徐季钧，号古梅钝根生，曾在《叻报》任事，擅写社论，专题发挥。另一主笔林箬箬，号热血人，亦以撰述社论见长，其文正如其名，行文磅礴，充满爱国激情，写作甚勤；还有一个主笔是容濂丞；英文总主笔是林文庆，陈德逊副之。此外，操笔政的还有王会议，他曾在《星报》做过事。¹⁷

他们这批人也是好学会的主干。好学会原是林文庆发起的组织，成立于1896年，初期的会员以海峡华人为主。该会常通过主办演讲会与辩论会的活动，以提高会员对政治、文学、艺术与科学等方面的认识。1899年，林文庆决定扩大活动范围，招收受华文教育者入会，丘菽园等人后来都成为好学会的活跃分子。

跟过去的华文日报一样，除星期天与节日假期外，《天南新报》每日出版一纸8大版，不同的是，《天南新报》有更多的新闻报道，用该报的话说：在“所有中国商口，皆设访事电传要务，与本坡西报声气相通，消息较为灵捷”。¹⁸其排版也比《叻报》与《星报》有所改善，比较整齐美观，不同地域的新闻放在一起，各得其所。如以1898年6月2日的报纸为例，其排版如下：第1版有丘菽园的社论、报馆的告白与声明；第2版

有上接社论、英美电音、翻译新闻（译自香港华字英报与上海西字报）；第3版有本坡新闻，各报论说；第4版有各报新闻（选自《广州报》、《求是报》、《天津报》与《农学报》）；第5版有国外新闻与京报选登；第6、7与8版都是广告。但自从1900年底丘菽园脱离《天南新报》后，报纸的内容与排版都有改变。改版后的报纸，内容反而不如过去的充实。

《天南新报》具有爱国的激情主义思想，它对中国政治发展比本地的更表关注。这也难怪，在其8年的报龄中，中国正是风云激荡，处于极端内忧外患之境地。先是有康梁的维新运动，继有义和团之动乱所引起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些事件及其掀起的荡漾的余波，严重威胁中国的亡国灭种，自然就成了《天南新报》评论的课题。

维新运动发轫于戊戌年(1898)6月中旬，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推行变法。到了是年9月，维新运动受到了慈禧太后及保守派的反击扑灭，光绪帝被囚禁，康梁出走，六君子被害。《天南新报》对维新运动的立场是鲜明的，即反对慈禧太后废黜光绪，篡夺政权；主张还政于皇；它也反对追捕康梁，捕杀新党。因此，它认为太后垂帘听政，一意孤行，不足为喜，反引为忧（见《太后垂帘不足为喜电辨》，1898.9.27）；它主张在当前的局势下，只有光绪帝才能保中国，使中国变法图强（见《论保中国非赖皇上不可》，1899.4.12）；对于“西后忍心而权奸施毒，竟使我皇重受冷月凄号之苦”，《天南新报》深表哀痛，呈请海外华商一而再，再而三“电请圣安，并请皇太后归政”（《海外华商宜再举行电请圣安并请皇太后归政说》，1890.12.28）。它强调“维新之说，实吾四万兆人所共有之心，亦即吾四百兆人所难缓之公事也”（《论维新为国民公事》，1899.12.7）；政变之后，保守派追捕康梁余党，雷厉风行，《天南新报》警告说：“若必严行捕戮，绝其故国之

望，恐此等热血多而涵养少之人激而思变（《论严治新党非中国之福》，1898.11.15）。

《天南新报》虽未发展到今天报纸的水平，但它对新加坡华文报业作了两大贡献。首先是扬弃了过去报纸“有闻必录”的态度，而选择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其次是藉报纸作为发抒爱国情怀与改革运动的工具。此外，《天南新报》一开始就设了“杂著附刊”栏，刊载丘菽园的著作《五百石洞天挥尘》，这不啻开拓了后来华文报增设副刊的先河。

《天南新报》的销售额虽不错，但报费的难收以及广告的难度，使其财政陷于困境。一度停刊了几个月，后来几经挣扎复刊，在逆境中求存，但最终还是抵不过迎头恶浪，于1905年宣告寿终正寝。¹⁹

（4）日新报（1899—1903）

《日新报》的前身是《星报》，后者停刊数个月，经过改组后易名为《日新报》。报刊号数接前《星报》而为2876号，该号于1898年10月5日问世。

《日新报》之命名，取其“苟日新又日新”之义。正如该报所说的“日报者，以日为期，日出一报并不相同，则有新新之义焉……所有新闻、新理、新学、新法，凡可以新人耳目，新人识见，新人学问，新人心思者，莫不采登于报，将与众而共其新焉”。²⁰

比起《星报》来，《日新报》加强其通讯网及翻译新闻工作，它“延聘京外各友充当采访，遇有京都及内地要事，随时录报”，并“增设翻译，广译西报，庶阅报诸君得以周知中外之道”。²¹

《日新报》的业主是林文庆，他必然也参与了《日新报》

的改组工作,并拟订该报的决策与方针。林文庆习医,1892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EDINBURGH UNIVERSITY),嗣后返回新加坡悬壶行医。他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与改革家。林氏醉心西学,也推崇儒家思想;他致力于改革新加坡华人(包括海峡华人与移民)的思想与习俗,也同情中国的维新运动。²²因此,《日新报》就成了林文庆及其同僚散播思想、推动改革与教育读者的工具。该报常译载西报有关时事论析的专论;²³发表推崇儒家思想的专文;²⁴华人好学会是提高华人政治与文化的组织,《日新报》没有忘却这方面的宣传;²⁵该报当然更关注中国的变局,当1900年后期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导致中国日益危亡之际,《日新报》推出了一系列的论说,论析了中国之困境与其补救之道。²⁶

《日新报》的编辑阵容不详。撰述论说的多署笔名,常见的有:天寥子、拙庐主人、佩弦生、剑菴主人等,至于这些人的真名实姓,在报馆担任什么职务,其学历如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间的新加坡华文日报,同时存在的有《叻报》、《天南新报》与《日新报》,三者的编排方式与内容都大同小异,那期间的华文报读者不多,招揽商家广告不易,在剧烈的竞争下,后起的《日新报》处于不利之境地,最终于1903年宣告倒闭。²⁷

(三) 20世纪前期的华文报刊

20世纪首40年间,由于客观环境的需求,华文出版物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不仅大型的日报相继兴起,彼此辉映,竞争剧烈。连小报与杂志的出版,在20年代以后也前仆后继,蔚为风尚。

为清眉目起见,先将各种日报列于表1。

由表1可见，这期间存在的日报，共达14家之多，有时有4、5家报纸并存，竞争剧烈。有些报龄颇长，约达半个世纪，如《叻报》、《南洋总汇报》、《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即为显著的例子。这期间日报数量之多，报龄之长，反映了华报有广大的读者群；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若干资本家与新闻从业员的执著与艰苦奋斗的崇高精神。要知道，除了一两家规模较大的华报之外，其他华报都无利可图，甚至于长年亏蚀。但报人为了完成某种特殊的使命，或宣扬某种政治思想，殚精竭虑，奋力支撑，直至无法维持为止。

这期间的华报，不论是党报或是私营的报纸，都沾染了浓烈的中国政治意识，并表现了不同的政治立场，其立场也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异而转移。这里拟就这方面将华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 1900年—1911年，保皇党与革命党论争的阶段；(2) 1912年—1927年，军阀割据论争的阶段；与(3) 1928年—1941年，北伐以后外患频仍的阶段。兹分述如下：

(1) 保皇党与革命党的论争1900—1911

如前所述，支持康梁维新运动的舆论，有丘菽园的《天南新报》，但到了1905年，《天南新报》因经费枯竭而收盘。接下来的另一份保皇党的机关报是《南洋总汇报》。说来有点滑稽，《总汇报》原是革命党张永福等人创办的，嗣后邀请了商人朱子佩等参股，商人思想保守，不满《总汇报》宣扬革命思想，与革命党人摊牌，结果是张永福等人退出，《总汇报》遂沦为保皇党人的喉舌报。²⁸

嗣后，《总汇报》获得了康梁门徒的加盟，他们是徐勤、欧榭甲与伍宪子。来此之前，他们都曾在日本与香港等地主持报业，富有办报经验。自他们加盟后，《总汇报》就成了保皇